

作为意义主体的“后人类”：人类之后的符号学

赵毅衡

DOI:10.14065/j.cnki.nfw.2025.01.026

人将被抹去，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。

——福柯《词与物：人文科学的考古学》^①

“后人类”，英文 post-humanism，无论是中文或英文，词义都不是很清楚。经过近半个世纪来的激烈讨论，这概念可能被弄得更加复杂。尤其是这个关键概念对人类作为意义活动主体的影响，更是没有被仔细关注。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特征的学说，“后人类”还有意义活动吗？这种意义活动还需要符号承载吗？“后人类符号学”可能会是什么样子？这是本论文要讨论的课题。

“后人类时代”，是“人类的后期”，还是“人类之后”。这是英文前缀“post-”本有的歧义。英文词典解释“post-”：“这是指向一种情景的前缀，此时后面的词不再有关或不再重要（no longer relevant or significant）。”显然，“不再重要”就是还在，但降到次要地位；而“不再有关”就是已经消失，或等同于消失。显然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情况。

有一种意见，认为“后人类”与人类时代重叠。凯瑟琳·海勒（Katherine Hayles）在《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：文学、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性的终结，它也不是反人类的……后人类涉及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共同关系。这种共同关系或合作包含发展新的思维方式（此方式关乎成为存在意味着什么），并提供一个机会来重估我们与其他‘存在’的关系。”^②在她看来，至少在某个阶段，后人类主义并不是人类终结之后。另一位思索此问题的学者奥勒·哈格斯特姆（Olle Häggström）也认为，“我们必须坚持留有一些人的本质，即人的某种整体性，因为这极为重要”^③。

但是本论文讨论的历史过程，似乎认为“后人类”必将完全代替人类。人工智能的各种形态进化得太迅疾，从大历史的观念看，“后人类”的来到几乎是一种断裂。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有道理，取决于我们用何种尺度衡量这段历史。

至少在目前，必须看到后人类主义“转向”造

成的巨大变化，但是也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过渡，即明白说清这两个时期是如何断裂，又是如何衔接的。本论文将说明，向“后人类”过渡的征兆很早就开始出现，正因为他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，它才会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未来，这就是我们必须为之做准备的原因。

作为一种思潮的“后人类主义”，已经在思想史上演变了几个阶段，而在当前，以下三种思想并存，重点逐渐过渡：

首先是“去人类中心主义”，即不再把人的利益，尤其是无限的“现代化”发展，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，具体来说就是“生态保护主义”。按照这种新的哲学人类学观点，许多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实践能力和意义能力，早已存在于其他物种，如工具使用和制造、符号的应用、主客观关系的建立。在这些方面，人类的独特性并不是绝对的，人的发展与其他物种的发展有重叠。

其次出现的是“后人文主义”，认为启蒙时代开始确立的“人为万物之灵”想法已经过时。这种思想是“后现代主义”的组成部分。早在1977年，伊哈布·哈桑（Ihab Hassan）就提出，“应该明白，历时五百多年的人文主义秩序也许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因为它已经转型为我们必须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”^④。他是在思考人类如何走出原有的生存界限与意义框架。哈桑把后人类主义视为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的反思^⑤。由人性构成的道德高度，复原至众多自然物种的品格。

最后是人工智能迅疾发展造成的思想冲击，人类将被超越，被称为“后人类”的新的历史终将出现。此意义接近“超越人类”的思想，强调摆脱了人类之后的未来世界。强调对人类的彻底排除，探寻那些无关人类生活的非人之物^⑥。这个观念比以上两种观点更为后出，显然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，人工智能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后才出现的。

本论文不会仔细讨论“后人类主义”的头上两步，不重谈“去人类中心主义”和“后人文主义”，

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讨论已经相当多，而且它们主要是对人类的重估。本论文将集中力量谈第三种，即预示人工智能“超越人类”的未来式后人类主义。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一种思潮，而是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，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对人类最大的冲击。人工智能具有直接影响到人类未来的潜力，其发展的迅猛势态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是至为深远。

显然，“后人类主义”说的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，人如何摆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。但是具体的“后人类”（posthuman）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异呢？转变的关键，是人的智能与身体、心与物结合的方式。心智固然是存在的最基本要素，身体的演变却是实在可见。身体对人的意义活动承载方式，可以有以下演变过程：

- 肉身人
- 赛博人
- 硅基人
- 虚拟人
- 人类世残迹

这张单子，把后人类演变的可能一一排列出来，似乎异想天开。实际上前四种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上，只是尚未引发足够的注意，似乎只是科幻叙事的题材。当然，把它们称作各种“人”，是让类人便于想象的比拟说法，尤其是汉语偏向于在复合词组加上种属词，想必未来的历史会有新的命名。技术将会消解人本主义的主体，凯瑟琳·海勒探讨了三种身体：信息身体、赛博身体和后人类身体^⑦。我个人建议，从人类到后人类，其中的演变层次还要多一些，故有此表。

一、肉身人（身心俱全）

肉体的身体性是人类在物质世界的“自然”生命形式，这一点每个人“感同身受”，似乎并不需要说明。但几千年来大多数思想者认为，人的存在是靠“灵魂”，人认知世界靠的是“心智”，与此相对的肉体，是易朽的、不洁的，与动物类近。自柏拉图的“理念说”开始，人类就似乎忘记了自身的肉体，一味颂扬理性精神的独立存在。

虽然人所有的意义活动，都要通过肉身。人对世界的感知，是肉身器官的感知；人的意义表达，靠的是身体器官（声音、表情、姿势）。人的肉身的独特性，形成具身化的世界体验和文化格局，这似

乎是常识，无可足道，也不必深究。虽然汉代的《黄帝内经》已经把身体看成是宇宙秩序的体现，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，人体的解剖已经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，但是“我思”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源头，这个想法在现代反而得到加强。

对此，某些古代哲人是有反思的。王夫之评《庄子》的“神人”之说：“盖人之生也，形成而神因附之。形蔽而不足以居神，则神舍之而去；舍之以去，而神者非神也。寓于形而谓之神，不寓于形，天而已矣。”^⑧人生来具有的“形”是“神”的寄托，也是“神”的保证，脱离身体之形的“神”实际上是“非神”。尼采也悟到身体是不可或缺的，他说过：“你身体里的理性比你的最高智慧里的理性更丰富。”^⑨

人的肉身性，是因为人的意义活动并不是纯粹的思维，而是身体带动的精神活动。法国存在主义符号学家梅洛-庞蒂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：应当从本体论角度看待身体，物质性身体的具身存在，是身体意义活动的根基：时间是由身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，空间则由身体承载，因此肉身是意义活动的内在出发点。因此，人的意义活动是“具身性”的（embodied），主体性是物质性/意向性的双重结构，而“肉身”即是认识这个世界的经验图式^⑩。

梅洛-庞蒂的意义“具身性”理论影响巨大，成为现代思想过渡到后现代思想的关键之一。为了建立一个包容“非人类”的文明，就必须承认人的肉身性存在，这是人与其他物种共情的出发点。既然人类在生物界并非绝对特殊，人类文明的形态，应当是包容“非人类”品格的文明。这就是为什么“肉身性”理论，也是后人类主义最早的着眼点。

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更进一步指出：正因为人都是肉身的存在，责任伦理发生在人与他人之间：“相对于这一应承而言，我是不足的和有缺陷的。而这就好像是，我已经是要对它之必死做出应承的，而且对我自己之幸存感到有罪一样。”^⑪此种看法，用人的异质性打破了传统主体的总体性。而德里达则认为人与他人之间的“应承”是不够的，应当延展到其他生物：“承认伦理学延伸到所有生物，我们不应该让动物遭受‘不必要的’痛苦。”^⑫

法国电影符号学家拉·梅特里曾说，“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”^⑬。身体不只是会生产饥饿、痛苦这些普通感觉，也会产生需要，而这些需要进入大脑生出欲望符号。他说：“这就是我所想

的：人类怎样通过了他的感觉，亦即他的本能来获得精神，最后又通过了他的精神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。”^⑩这就消除了人的意识来源的神秘主义，以及人的神创学说的根基。他说的“人体机器”是个比喻，但是后来却落到了实处。

符号学对此“物种扩展”思想，反应可能比其他学科都早。符号学家西比奥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“Global Semiotics”，此词语义双关，既是“全域的符号学”，又是“全球的符号学”。他的意思是：意义的符号过程，与生命过程同时并存，意义的接受者其他生命体，但也包括不同种族的他人，即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。意义过程的研究领域，不仅局限于意义过程的认知维度，更侧重于各种生命的伦理完善性，以及对生命的呵护^⑪。各种生物都有符号传送解释的意义过程，只是人类能自觉地使用符号，因此，人类不仅是如卡西尔所说的“使用符号的动物”（animal symbolicum），而且是“符号学动物”（semiotic animal），即意识到自己的符号活动的动物，由此，人必须对地球生命的“全域”负起伦理责任。

从“肉身性”来理解人的存在，传统的“人为万物灵”思想，就被后现代思想解构了。人的身体本身就成为一种“待变之物”，新型的身心关系就可能由此而生。

二、心全身补的赛博人

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深入人的身体之内。人与技术性部分合体，即部分行的“义体”（prosthesis）很早就开始出现。一般认为这些技术性修补，是人身之外在的添加物。但20世纪后期起，人类身体进入新的形态：当这些体外事物渐渐被人体“内化”，特别是当他们不再是受损身体的技术性修补（假肢等），而是提高了身体机能，例如红外线眼镜，或VR面具，即所谓“增强”（enhancement）。当“义体”部分成为身体的主要部分，就开始出现后来称作“赛博人”的形态端倪。

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“身体技术”思想，已经可以看到对身体的这种技术化改造，对人的根本社会存在形态的影响。1934年法国哲学家莫斯（Marcel Mauss）提出“身体技术”的概念。他认为既然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最自然的工具，工具就不是外在于人的技术，而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部分；50年代加拿大思想家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（Marcel

McLuhan）的著名理论“媒介即人的延伸”，实际上是继续了此种“身体技术”理论，媒介技术被认为是身体与意义传达工具的融合；此后美国哲学家唐·伊德（Don Ihde）提出了“技术的身体”是“第二身体”的理论^⑫，技术与人的肉身更为连成一体，“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相互的，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，也在被技术利用”^⑬。

法国哲学家布鲁诺·拉图尔则更进一步认为：现代人类的世界观受制于传统二元论，将自然和社会视为两个独立存在的领域，导致人们无法参透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渗透的关系。他主张打破主体和客体、社会和自然之间二分的现代性思维模式，由此他改造了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“行动者”（actant）理论，将技术（物）视为具有能动性的“行动者”。依据这种理论，心与物的“二元论”在当代世界不一定再是合理的：“外在世界并不存在，这并不是说世界根本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。”^⑭这种“后二元论”的思想与“后人类主义”合流，促成这样一种新观念：主体性也不再是人类独有的属性。他要求平等看待“人类”和“与之互动的非人类实体”，各种工具也是能动主体的来源。

这些理论直接为后人类主义的“人机合体”思想提供了哲学思辨基础。凯瑟琳·海勒明确指出了这条思想发展线索：“后人类的观点认为，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，因此，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，并且，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。”^⑮如果大脑把意义信息传递给身体，身体又传送到工具，三者就合成一个整体。当代人生活中已经无法离开的手机、电脑、GPS、自动驾驶，无人飞机等技术，人类身心及其技术延伸，渐渐成为一个新生的物种，即“赛博人”。

1960年，美国科学家曼菲雷德·克林斯（Manfred Clynes）和内森·克莱恩（Nathan Kline）在《赛博格与空间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“赛博人”（Cyborg，即人机合体）的概念。两位科学家认为，要想解决如何应对漫长的星际航行会遇到的种种难题，只有让神经控制装置与有机身体的结合，才能增强人类的能力，让技术成为人类主体功能的一部分。

所有这些思想观点，到20世纪80年代，在电脑与互联网的加持下，诞生了关于赛博人的比较完整的建议。1985年唐娜·哈拉维（Donna Haraway）发

表的“赛博人宣言”，让对赛博人的论述成为后人类主义的重要一环。哈拉维对赛博人的定义是：“一个控制有机体，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，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，同时也是虚拟的构造物。”^③

哈拉维不是想去除有机身体本身，而是将肉体与机器结合起来。哈拉维提出，赛博人与肉身的人区分是一个“技术政治”问题，也就是人生在世的根本方式问题。传统的肉身主体是高度整体化的，需要一个“有机体政治”^④。而赛博人的身体只是不再以整体的，而以临时的多变的方式出现。

哈拉维的“宣言”有点惊世骇俗，似乎在宣布一种新的物种诞生。但是从前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“身体技术化”并非突然出现的思想。现在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，已经严重地渗入人类的意义活动，实际上医学已经在不断地切入人的解剖学身体。人类身体经由媒介技术延伸到虚拟空间中，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实现环境与现实生活的交织。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成熟，在可见的未来，基因编辑、人工胚胎、脑机接口等，已经在增强肉身的功能。技术不仅在治疗疾病，而且成为身体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和过程，它们不再是健康技术，而是生命技术^⑤。当技术已经渗入身体时，人和技术之间开始出现共生。因此，赛博人是一种崭新的意义主体：肉身处于现实世界，感官进入虚拟世界中，从而实现意义信息流的相互作用。赛博人身体的意义建构，已经把变成信息和实体之间的相互实现的场所。

这种赛博人并不是完全不会造成理论的困惑。既然他们是一种“杂糅”，若仍然以传统的人类身份来规范，就是无视人类身体范式“巨变”的现实；但若完全将赛博人当成一种全新物种，与传统的肉身人完全割裂，那又意味着否定了赛博人自然肉身部分存在的必要。这会意味着赛博人将中断在人类身体、身份文化的历史谱系的断裂。

传统的人类主体能否，能否凭此种“人机合体变异”的身体，识别出一个稳定的自我镜像？在身体范式转换的途中，一旦主体发现自己失去“肉身”，但又不是彻头彻尾的机器，主体或许会在人和“非人”的不确定性之间摇摆。在许多科幻叙述中，这构成了主体的焦虑：主体先前通过身体来确认自我身份的努力，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困难。“我是谁？”这个主体身份问题，始终是人机合体技术所不得不面临的文化难题。

在现实之中，在“脑机接口”受试者中，这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显形，但已经迫在眉睫。我们的

希望是：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如果美容手术后的能如此欣赏自己的“加强版”，那么人机合体的其他方式，也会让主体在感知中接受自我。

三、机身机心的硅基人

对“后人类”的第三种理解，更进了一步：拥有有机身体的碳基人（carbon-based human）“过时”之后，世界上将新出“硅基人”（silicon-based entity），也就是肉身全被数字技术所需的原件取代。人类不得不与之共存于这个世界，此种新的智能体，或许会成为地球上比人类更有效率的生产者、工作者、创造者，甚至领导者。

硅基人，也就是全电脑人，又称数字人（Homo Digitus，或 Digient），而是由计算机替代头脑，替代基因编码，因此我在另一篇文章中，称之为“异智能体”（intelligent alien）^⑥。原先统称为“机器人”（robot）一词并不太合适。此词来自捷克语，原意为“工作者”，中译“机器人”有点误导，似乎内部全由齿轮连杆组成，类似工厂流水线上的“机械臂”。只是由于人的审美需要，或是科幻电影的需要，才蒙上了一层表皮。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·迪克（Philip K. Dick）的小说里写到人机战场场景：“一枪打得齿轮飞散开来。”^⑦当年超前的想象也似乎陈旧得太快。

柯代洛（J. Cordeiro）认为，哪怕超人类，也不会是静止不变，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变异^⑧。另一位后人类问题思考者马克斯·铁马克（Max Tegmark）称此种后人类为“生命3.0”：人类从纯粹的生物性演化升级到数字科技，而数字流不一定需要肉身器官。“这种生命形态可以同时大幅改变自身的软硬件设施，不用经历过去那种缓慢的演化，而能达到快速进化。”^⑨由于其身体大多是芯片等数控单元，硅基人的身体形态我们目前无法预料，可能完全不需要人类样式的身体结构：不需要人类过于复杂的汲取能量方法，不需要人类的低效而危险的生殖系统，也不需要人的脆弱的肢体运动方式。唯一必需的是意义流（用于自身的控制，以及与外界的交流）必须有感知器官与符号发送器官。由于所用的媒介可能与人类很不相同，所以很难想象器官的外形。当然，也必须有信息加工器官以及意义产生的器官，类似人类的大脑，但其体积可能很小却效率极高，甚至可能外置身体，由电磁波遥控二者。

硅基人很可能不再有遗忘，人类的经验意义主

体需要遗忘的帮助，用高度选择性积累方式形成，可能已经不再有用。甚至教育的选择性传递知识，也可能用数字下载，没有必要穷年经月培养。而数字控制的中心处理器，或许还称为“电脑”，已经从符号机器变成元符号机器，每个工作部分的电子元件，或许就能做部分意义思考，就像我们碳基人的肢体器官有单独的反应能力。由此，硅基人中心处理器加工的符号量，比人记忆中储存的数量大得多。一旦有元符号能力，符号升级的速度也会比人脑快得多。

到那一天，机器进化出超越人类的决策元符号能力，它可能为新的文化制定新规则。一旦硅基人自身获得了元符号的无限升级能力，或许会创造一个独立于人类的意义世界的元符号文化价值体系。无论如何，“数字人”将成为决策者。

拥有超强能力的“人机”，是新的社会领袖。“加载”或许昂贵（因为不需要那么多高效的硅基人）。硅基人的最大特点是既有超强学习能力（机器的信号加工），又有超强元符号能力（电脑的判断、裁决）。也许它们“出生”时就经过就下载了基础算法与已经积累的左右数据，分配了高功能的判断元语言。硅基人的优生学，只会生产一部分更为升级的“后代”，让个体的更新催动社会的发展。如此一来，数字人没有隐私，没有隐私就没有个性。目前的隐私丢失（人脸识别、信息打包等）已经造成重大社会问题。意义是主观与客观的交流，没有自己独特的符号意义处理方式，就没有主体性。

我们碳基人很为珍惜的许多东西，信仰、宗教、情感（爱与恨）都会消失，因为非理性、无效率。艺术，本质上是“超越庸常生活需要”的符号文本，也似乎没有必要存在。这些“感情”本来就是人类中心的产物，是人类需要的繁衍后代、集群求生、团体共同御敌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要素。我们很难苛责硅基人没有这种“人性”。或许更合理的预测是，硅基人会有我们很难想象其形态的“艺术”“信仰”“情感”出现。或许对于此种“后人类”来说，排他性的“抱团合群”的感情肯定会出现，只是当人类消除了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”心态，我们不会欣赏后人类产生类似的“感情”。

至于人们经常指出的，人工智能缺少“自我意识”，这问题没有那么神秘，从符号学来看，自我意识只是明白“自己在使用符号”。研究AI符号学的学者胡易容，也认为意识问题并不神秘，是人工智能的定义中的成分：“人类实际上是与一个自我的分身

发生的交流游戏。当人类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训练人工智能的过程，当人工智能接入互联网的时候，它吸纳的就是人类的意识……‘懂得’我们的，不是一个机器他者，而是另一个自我。”到那时，现在人类所拥有的，基于肉身人需要的各种“人性”的表现，一部分会消失，一部分改变了方式，例如“自我意识”，只是我们再也无法用人类感情的标准识别而已。

实际上，由于人不会再有器官老化、机体衰退、病变或伤害，不再有死亡，那样也就不需要生育，爱情与亲情的胜利基础就不再存在。人类的代际进步，由电脑“升级”处理，“向死而生”的经历恐惧而存在，变成“向退化而生”的替代忧虑。非效率论的反思，非价值导向的犹疑，非目的的自我怀疑，就不会出现。我们经常读到“机器人自杀”的新闻，或许，没有“惜生”的反思活动作为刹车，它们真会“勇往直前”投向毁灭。据报道：俄罗斯的指路机器人Promobot IR77机器人居然一周时间之内两次试图从实验室逃脱，并且成功了。在第一次跑出50米，上大街造成了“局部交通瘫痪”之后，开发者对其进行过两次重新编程，却无法阻止它的再次成功出逃，只好打算拆掉了事^⑥。还有家务清洁机器人iRobot Roomba 760自杀事件，由于清理玉米粥泼翻的地板，“不堪重负”，它爬到了厨房的电烤盘上，成功自焚^⑦。这些都是可供一笑的阴谋论，或有趣的广告。如果硅基人会有如此的“个性化”选择，自我了断，它们或许将会创造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文化。

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：它们的硅基身体更不容易受伤，也比人类的肉身更加灵活，“肉身”虽然不再，智能直接指挥的器官，效率远超于人类。哪怕它们尚未完全脱离所谓“弱人工智能”阶段，也比人脑的数据加工能力强大得多。所谓弱人工智能/强人工智能，这种划分源自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（John Searle），他指出弱人工智能仅是对人脑思维的模拟，尚未能产生意识；而强人工智能，意味着被执行的程序本身就是思维的组成部分，计算机程序本身就是大脑（而非心智）^⑧。看来硅基人已经开始从弱人工智能过渡到强人工智能，不过在根本性的存在样式上，硅基人依然是人类生命体的模仿，他们依然有一个“身体”。

很难想象这样一种硅基人会羡慕人的心理状态。在《终结者》（The Terminator）系列电影中，未来时代的超人类与人类发生地球争夺战，遇到人类有组织的反抗，于是超人类派出“终结者”穿越到

现在，刺杀“未来”的人类领袖。结果却是终结者在与人类亲密接触中，发现了自己缺乏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类的情感。当超人类发现这种感情的美好，他也被感动了。

很多思考者对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可能发生的对抗忧心忡忡。当人工智能摆脱了人类的奴役，有了自主发展权之后，很有可能注意与人类“协商合作”，因为人类那时候已经成为弱者，成为缺乏存在价值的一种生物，身体生老病死易朽，使人的有限性会暴露无遗。电影《我，机器人》中似乎给出了人机合作的可能性：机器人种群中，某些个体具有“自主性”的价值判断，并不认同机器人族群对人类的“暴力镇压”，虽然这些个体也没有完全倒向人类立场，做人类的附庸。影片结尾，这种和解立场似乎取得了上风，似乎暗示开拓新的生存模式的远景。当然这些都是科幻叙述中的想象情节，但是既然超人类尚未完全出现，人类设想这些可能性是必要的。

四、身心具虚的虚拟人

对“后人类”可以有第四种理解：人类身体进入更加新的形态，已经可以想象一种无器官、无身体的“虚拟人”（virtual entity），实际上当今世界，已经看到出现其初级形式。

德勒兹（Gilles Deleuze）很早就想象过“无器官的存在”，他说：“对我来说，欲望不包含任何匮乏；其不再是一种自然的给定；它与一个运行着的异质性装配浑融为一；它是过程，与结构或起源格格不入；它是情动，与情感恰恰相反……特别是，它意味着一种内在性场域或一种‘无器官身体’的构建。”^③一个无器官的身体，脱离了一切既定主体，正是德勒兹对未来人类之存在形态的想象。“无器官的身体”就可以不再受到任何机体束缚，以信息的纯虚拟态存在着。或许可以直接了当地说，无器官的身体才是后人类身体的最终形态，虚拟人可以无拘无束地、平滑地从赛博空间中的任意一点通向任意其他点。

德勒兹将后人类时代的主体化归结为四种“褶皱”（法文pli，英文fold），他强调的是变化的过渡方式。据他看来，莱布尼兹提出的单子论，认为世界是同一单子的不同组合方式，似乎被现代物理证明为千真万确。德勒兹却认为单子论是机械论的由来，他认为世界是各种“褶皱”形成的：肉身性褶皱、各种力之间关系的褶皱、知识或真理的褶皱、

外部自身的褶皱。这四种褶皱是“器官欲望”的变化，似乎是无可怀疑的具体实在，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的变化界面而已，最后会导致“无器官的身体”^④。

这就给“虚拟人”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出色的理论解释。玛蒂娜·罗斯布拉特（Martine Rothblatt）首先提出：这样一种后人类的终极形式是“虚拟人”，是数字技术催生的“去身性”后人类形式。也就是人类意识的彻底数字化、信息化，由此“告别肉体凡胎”。虚拟人就是纯数字人，“无器官”就可以实现“永生”。后人类能够取代人类的关键是，它们有人的各种意义行为和符号发送，却不一定需要一个笨拙而多灾多难的身体，因为，据罗斯布拉特说：“如果它们能像人类一样思考，那么它们就是人类。”^⑤

这样一种纯意义性的存在，还能够称作一种“人”吗？网络空间问题的理论家迈克尔·海姆（Michael Heim）认为：“（虚拟实在中的）‘虚拟’这个词，所指是一种不是正式的、真正的实在。当我们把网络空间称作虚拟空间时，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，而是某种和真实的硬件空间相对比而存在的东西，但其运作则好像是真实空间似的。”^⑥网络空间中的存在，只是人类理解必要的“比喻”。

后人类身体也在随着技术的脚步而延展；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虚拟世界，身体也便延伸到了虚拟世界。“我们如果视宇宙在本质上由信息组成，这些（虚拟）‘生物’就是生命体。”^⑦虚拟人实际上存在于信息空间，“数字范式意味着物质世界逐渐数字化，它是虚拟和真实的结合，虚拟人的身体，既可以被认为与现实身体同样的真实：可视、可触、可感甚至可以自由互动，也可以处于不可见中，只是需要语言或图像符号形式来应对对人类感知”。

我们只是犹豫：假若意识能独立存在于虚拟世界，这样的后人类是否还能够被称为后“人类”呢？

当我们进入虚拟世界，其实就已经重新建构了整个经验世界的认知框架。舍普认为：“传统意义上的空间——康德所说的空间——是经历的先天条件：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。可是虚拟空间不同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，它本身就是经历。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。它不但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，而且是在人们对它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。”^⑧也就是说，虚拟人实际上是一种“纯意义存在”，意大利符号学家莱昂内称之为“潜

形”(latent)的符号载体承载的意义构成^⑤。

基于虚拟技术,任何智能媒介载体都可成为虚拟智人的“身体”,身体也不再是囚禁灵魂的牢笼,而是任何媒介中信息意义的集合。这样就使主体得到了自由和解放。同时,承载意识的各种媒介,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类“身体的延伸”,而可以说是人类“意识的延伸”。在“万物皆媒”的环境下,或许虚拟智人可以存在于肉身有机体、存在于赛博身体、虚拟身体,但各种借居身体之间不再有本质区别,因为它们都纯粹是“信息的集合”。

以上关于“无身体器官的虚拟人”的思索,似乎是凭虚蹈空的狂想,实际上却已经开始出现雏形。首先出现的是一批“虚拟人网红”:2007年日本的虚拟歌姬“初音未来”被设定为永驻于16岁,具有固定的身高、生日、音域等,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,但二维动漫风格的身体,并不是她生存的“身体”,她的“身体”是合成软件形成的光波;2014年,中国少女歌手洛天依也成为二维虚拟网红歌手;2016年4月,虚拟偶像、19岁的巴西裔模特米凯拉(Miquela)问世,于2018年登陆社交媒体,目前拥有160余万粉丝,她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音乐专辑,还经常与众多名人或粉丝合框;2018年在中国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,新华社与搜狗联合发布世界首款虚拟人主播。

科幻电影中常将这一类虚拟人称作“连接人”,因为他们总是呈现为无体形的互联互通,即一种信息编码的文本,它们的身体和身份实为数据空间结构。此类科幻叙述中最典型的,就是《黑客帝国》三部曲:现实世界是由一个找不到实体,却又无所不在的“母体”(Matrix)所安排的“矩阵”,但这个居住着虚拟人的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现实,它无所不在,甚至在人们的思想之中。主人公(残存的人类代表)在对抗的,是一个程序:虚拟人能超越常人,因为它们是一个程序的虚拟存在,所以可以不断借用别的身体,可以无中生有地空间切换。这部系列电影虽然以藏身的人类反抗为主线,但是反抗的主人公尼奥本身最后也被证明是虚拟的存在。

五、人类世残迹(过去式人类)

第五种理解:人类的时代成为过去式,人类文明结束,地球换了新主人,而人类文明只剩下遗迹,地质变化渐渐把人类文明变成地层中的“人类世沉积”(anthropocene sediments),即将开始地球

史,或许可以称之为“数字世”(Digitocene),它可能延展很长时间。在这个“数字世”,人类可能存活,只是作为“人类世”的盲肠式遗留,即进化的残存物。

当“后人类”充分发展后,人类时代已经消失,剩下的残迹在地层中形成了一个考古学,甚至地质学的遗迹:水泥早就风化,钢筋已经锈蚀,连人类制造的最耐久的物件——塑料——最终也被新进化出来的细菌分解。人类在地球上建设起来的宏伟辉煌的文明,到最后不仅成为历史,而且成为史前史。

“人类世”至今只是一个想象的“远未来”才有的地质史概念,但是本文描述的过程继续下去,很有可能出现的前景。这样一个世界会是地球的前景吗?“后人类”最后还需要人类引以为傲的巨量建筑群吗?如果硅基人和虚拟人成为世界的主流,的确这些蛮横粗劣的建筑,不会是“后人类”文明的必要的寄居之处。现有的人类生成物,到最后会变成地层残留物,这个看起来“悲观”的“末日后场景”,却或许是人类最乐观的结局。

“人类世”这个概念最早由1995年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·克鲁岑(Paul Crutzen)提出。2019年*Nature*报道,一个专家小组正在起草报告,准备2021年向国际地质委员会正式申请: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时代。尽管人类文明在地表留下明显痕迹,但是人类被后人类彻底替代后,新的文明或许不需要如此的实物堆积。

恐龙在地球上的统治持续了近乎于永恒的1.8亿年,而人类从洞窟岩画开始的符号文明历史,只有4万年。人类会留下什么样的残骸堆积,取决于未来的观察者是谁。“后人类”中的“地质学家”,或是几万光年的时空过来考察地球的外星人?地质概念的“人类世”是否成立,要看他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残留物。

约7000年前人类农耕生活开始,人口增多,地表植被发生重大改变;4000年前人类产品材料变化,地层中出现陶器,织物、铜铁金属等;200年前,大工业时代开始,地层出现各种工业品与巨大的建筑;而75年前,人类用原子能做武器或工具开始,地层中出现放射性同位素。不过未来的观察者可能寻找另一种沉积物:他们可能留意寻找曾被称作“芯片”的小片硅,不是用于切割刺杀,而是用来存储数据,传送信息。

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会成为“人类世”考古发掘的重点,即“后人类”是如何渐渐演变出来

的：地球经过了几个创新和开放的世纪，芯片集中积留的地层，是符号意义传播发达的世代。这个世纪的空间遗留物，大多是为符号意义交流而用，而并非纯粹的生命活动。从公元第三个千年开始，迅速从人类接手的，是一种新的生命体，即本文所推测的各种“后人类”形态演变，也就是说，本文讨论的奇异“前瞻”，可能是“数字世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份回顾性考古报告。

工具与武器是人身体的延伸；媒介是人的符号表达与感知能力的延伸；电脑是人处理符号意义能力的延伸，而作为“后人类”智能体的AI，不再是人的延伸。它们渐渐获得足够意识，能力自主判断意义，甚至拥有“生存还是毁灭”的最高元符号决定权。一旦“后人类”不再是人类加上器官延伸，新型的生命居住于地球甚至其他行星。“人类世”就成为地质现象，因为它可能只是后人类的“数字世”的一个短小前奏。■

【注释】

① 米歇尔·福柯：《词与物：人文科学的考古学》，莫伟民译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16，第392页。

②⑦⑨⑭ 凯瑟琳·海勒：《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：文学、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》，刘宇清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7，第4、3、4、66页。

③ 奥勒·哈格斯特姆：《未来科技通史》，刘浩、张尧然译，新世界出版社，2019，第63页。

④⑤ Ihab Hassan. “Prometheus as Performer: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? A University Masque in Five Scenes”, *Georgia Review*, vol.31 (1977), p.843, p.843.

⑥ 苏丹：《生命、物质与数码物：后人类的三重伦理视域》，《宁波大学学报（人文科学版）》2024年第4期。

⑧ 王夫之：《庄子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64，第33页。

⑨ 尼采：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孙周兴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0，第34页。

⑩ 莫里斯·梅洛-庞蒂：《知觉现象学》，姜志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，第136页。

⑪ 列维纳斯：《另外于是，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》，伍晓明译注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9，第220页。

⑫ J. Derrida, *L'animal que donc je suis*, Paris: Édition Galilée, 2006, p. 149.

⑬⑭ 拉·梅特里：《人是机器》，顾寿观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59，第21、33页。

⑮ Petrilli, Susan. 2019. *Signs, Language and Listening: Semioethic Perspectives*. Toronto: Legas, p.8.

⑯⑰ Ihde, D. *Bodies in Technology*, Minneapolis &

London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02, p17, p137.

⑱ Bruno Latour. *Pandora's Hope*, 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. p.296.

⑳㉑ Donna Haraway, “A Cyborg Manifesto: Science, Technology, and Socialist-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”, *Simians, Cyborgs and Women: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*,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1, p.149, pp. 176-181.

㉒ Nikolas Rose. “Molecular Biopolitics, Somatic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Biocapital”, *Social Theory & Health*, 2007, 5 (1): 3-29.

㉓ 赵毅衡：《异智能体符号学的四个基本方面》，《新闻界》2024年第9期。

㉔ 菲利普·迪克：《菲利普·迪克科幻短篇小说集》，李广荣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13，1099页。

㉕ J. Cordeiro.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: From Humanism to Transhumanism. *World Futures Review*, 2014, 6 (3), 231-239.

㉖ 马克斯·铁马克：《人工智能时代 人类的蜕变与重生》，陈以礼译，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，第35页。

㉗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Promobot%20IR77/19763434?fr=ge_ala, 2024年8月13日查询。

㉘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B2%81%E5%A7%86%E5%B7%B4760/15626907?fr=ge_ala#3, 2024年8月13日查询。

㉙ Searle J R. “Minds, brains, and programs”, *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*, 1980, 3 (3): pp.417-424.

㉚ Gilles Deleuze et C. Parnet, *Dialogues*, Paris: Flammarion, 1996, p. 84.

㉛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, *Anti-Oedipus: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*,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, Mark Seem and Helen R.Lane,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83, p.104.

㉜ 罗斯布拉特：《虚拟人》，郭雪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6，中文版序“告别肉体凡胎”。

㉝ 迈克尔·海姆：《从界面到网络空间——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》，金吾伦、刘刚译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0，第1页。

㉞ R.舍普等：《技术帝国》，刘莉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9，第98页。

㉟ Massimo Leone, “The Semiotics of Latency: Deciphering the Invisible Patterns of the New Digital World”, *Semiotica*, 2024.

（赵毅衡，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当代艺术中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”成果之一，项目批准号：20&ZD049）